

论清末广东的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

——以欧榘甲的《新广东》为考察对象

魏燕齐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清末广东革命人士欧榘甲通过著名政论《新广东》一文,试图统一广东的内部族群,既表达了追求广东独立的地方主义思想,同时又把民族国家的建设要求置于眉睫之前。他的思想经历了地方“民族主义”的胎动和消解。对此政论深入研究,可以对清末南方地区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思想做一管之窥。

关键词: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新广东;欧榘甲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8)05-0044-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8.05.007

On the Loc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New Guangdong* by Ou Jujia

WEI Yan-q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Ou Jujia, a revolutionary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wrote a famous political commentary titled *New Guangdong*, attempting to unify the ethnic groups within Guangdong, which expressed the localism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Guangdong, and also brought earnest request of a nation state construction to the public. His concept had gone through the gest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local nationalism. Through the further study of *New Guangzhou*,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probe into the complex nature of the nationalism among then intellectuals in southern China.

Key Words: localism; nationalism; New Guangdong; Ou Jujia

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学者在论述 20 世纪
的民族主义时都这样开篇:“20 世纪是民族主
义的世纪。”民族主义是人类世界近现代史上
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是 19 世纪初在欧洲诞生的一
种学说。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被自然地划分为
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
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的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

政府。”^[1]即由一个民族根据某种理念建立民族
国家的思想和运动。中国清末的变革和民国的
建立亦离不开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纠葛。我
们可以确信,中国在清末民初所面临的变革是
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激荡的变革。在风云际会的
清末最后十几年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刻
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然而它的产生与

作者简介:魏燕齐(1990—),女,陕西安康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博物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研究。

发展却不是平铺直述的,其中的一条显性的发展道路,即由汉民族主义的觉醒到“大民族主义”升华,其发展过程已经为人熟知。而另一条略显隐性的道路,即从地方主义到民族主义的发展经过,尚未被人熟悉。特别是在中国南方,这一条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对中国近代的国家建设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研究已经纷纭杂沓,关于清末民初地方主义的研究也层见叠出。如美国著名汉学家杜赞奇,他在他的名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略论了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省自治话语的出现,并着重探讨了民国时期湖南和广东的联省自治运动^[2]。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施恩德(Andre Schmid)主编的《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中的部分文章、郑大华和邹小站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刘青峰主编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都从众多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又如,胡涤非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一书通过对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建立与衰败过程的具体考查,分析了民族主义在其中的历史作用。也有从其他角度探讨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关系的论文,如江远山的《近代中国地域政治化与国家建设——以省为考察对象》和《近代中国地域政治化研究——以广东为考察对象》、方平的《地方自治与清末知识界的民族国家想象》等,这些研究都以“省话语”的出现作为出发点,考察了省级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拓宽了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

关于广东地方主义这方面的研究也已有比较多的著述,比如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一书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多方面探讨了广东近代“地域文化”话语的建立过程。而对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欧榘甲

的研究目前还不多,只见宋德华和刘雪琴的《辛亥前期欧榘甲革命自立主张探析——以〈新广东〉为中心》,从欧榘甲在辛亥革命前期对革命派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探析了《新广东》一文,这对本文的撰写有着重要的帮助。

一、广东地方“民族主义”的胚胎——广东地方主义

(一)广东地方主义产生的条件

清末意义上的广东位于远离中央政府的东亚大陆的最南端,其北面的南岭成为阻隔中原文化的一条天然屏障,而南面的南海却便利地送来了西方的讯息,使之成为自古以来中外交往的要冲。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从秦汉时期就开始海上贸易,当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清朝闭关锁国之时,广州也是中国唯一允许进行海外贸易的城市。这样的一种地理区位,使得广东无论在政治、文化还是语言上都与北方中央王朝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能够与海外进行持续的交流,成为所谓的传统汉族十八省中最有可能独立甚至叛离中央王朝的地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侵略加剧,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广东部分地区的地方资产阶级精英阶层的经济地位不断巩固,新士绅阶层开始出现,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政治活动正在此时逐渐兴起。他们通过局部联合的形式,成立商会、农会等组织^[3]。由于他们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这些局部组织形式便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广州地方资产阶级精英和新士绅对办报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这些报刊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资产阶级和新士绅的政治和文化思想,成为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城市居民联络发动的重要手段,以及与官府抗衡的工具^[4]。报刊传媒业的发展,无疑为包括地方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思想现代意义上的传播提供了基本媒介。

政治上,作为新士绅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们

主张仿照西方的地方政制,这导致地方自治的呼声不断高涨,特别是在 1900 年以后,清王朝在外交上的软弱无能使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府组织形式的合理性遭到了各类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质疑,他们便希望通过各省的独立与自治来逐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此后,新士绅自发的小地方自治形式和官绅合办的小地方自治形式在广东逐渐开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广东普通民众的乡土之情^[5]。

(二) 广东地方主义的表现形式

1. 乡土志书与乡土教科书的编写

乡土志书与乡土教科书都是清末民初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出现的小学乡土教材,在清政府鼓励下各地自行编纂出版,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产物。晚清政府推行一系列新政,皆以日本和德国为楷模,由此,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传统对清末的乡土教育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从 1906 年到辛亥革命前夕,编纂和出版的乡土志书和乡土教科书至少有十几种^[6]。这些乡土志书和乡土教科书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和爱国意识,但同时也从多方面把广东塑造为一个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的独立单位,使地域意识和地方主义进入了正统的国民教育的范畴。在对地域意识的强化中,对族群差异的书写尤为明显。如 1906 年出版的《广东乡土史教科书》中所述:“南宋时,中原人避乱,多迁居南雄珠玑巷,故粤人多中国种。”这是把说粤方言的“粤人”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原谱系。同样的,由客家人主导编撰的《兴宁县乡土志》也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衣冠南渡”。“邑中人类,本中原衣冠旧族。宋南渡时,播迁转徙,多由闽赣而来,语言风俗,与土着异,故当时土着称为客家。厥后由县转徙他方者,遂自称客家,而并无改其语言风俗,示不忘本也。”^[7]

2. 精英文化的创造

精英文化指的是精英知识分子中的文人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8]。广东作为中国南方边陲,其地方文化传统虽然与北方中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在地方主义思潮的

作用下,清末的广东知识分子也开始试图创造用其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文化。

(1) 学术文化传统的追溯

清末南方系的革命派精英知识分子,在当时知识分子界日渐欧化的背景下,为复兴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于 1905 年创立了名为“国学保存会”的学术社团。作为广东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国学保存会成员黄节草就了《粤东学术源流史》一文,综述汉代以来岭南的经学发展,该文在 1908 年以《岭学源流》为题,刊登在该会的机关报刊《国粹学报》上^{[9]188}。

(2) 粤剧的“粤”化

有学者认为,“粤剧”一词可能在光绪年间开始出现并流行,但在光绪末年之前,广东演出的戏曲或者粤剧,并没有粤方言大量掺进戏曲以至成为其主体。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粤剧吸纳了粤方言区南音、龙舟、粤讴和咸水调的传统,这时,粤方言才渐渐成为粤剧剧本的主体。此后,粤剧成了革命先锋们在海内外宣扬革命、爱国与汉民族主义意识的传播媒介。这种把方言用作地方剧种主体语言的活动,使粤剧成为真正的粤剧,其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9]133-138}。

(3) 粤方言书籍的编写

在文言文作为官方书面语言的时代,广东精英知识分子为表达自己国家精英的身份,从来没有把用粤方言写作的文章和书籍纳入到他们观念中的“文化”范畴中去。广东民间的木鱼书、南音、咸水歌、粤讴、粤剧等粤方言文体虽种类繁多,但却不出声色娱乐之范畴,不能成为正统的“雅”。这种情形一直到 19 世纪末的最后十年才稍有改变。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各地为普及国民教育,提倡以白话办报和写作教科书。

真正应用粤方言撰写教科书并影响及于妇孺的实践家是康有为的一位学生陈子褒(1862—1922)。陈子褒虽然并非第一个用粤方言编写教科书的人(在陈子褒之前,南海人麦士治用白话译写了《书经》和《诗经》,分别在 1893 年和 1894 年出版),但他创新之处,不仅仅在于用粤方言白话写作教科书,更在于他的教科书的内容完全摆脱了传统封建儒家式启蒙教育的桎梏。

他于1903年编写的小学教材《妇孺三字四字五字书》,内容浅显,富于广东地方特色^[9]157-160。

二、广东地方“民族主义”的胎动和消解——对《新广东》的分析

清末民初广东的地方“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假想而非实际存在物。这个词用以描述在地方上未能成功提升成民族主义的地方主义,是我们为了方便考察其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刻意制造的概念。在此,我们必须使用一种历史目的论的观念,来描述清末民初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无意识中去努力塑造一个民族的可能,虽然这些努力在他们自身看来都只是国家民族主义框限下的地方主义。因此,如果我们把上文所提及的乡土志书和乡土教科书的编纂活动和精英文化传统的创造活动看成是在广东地方主义意识下所进行的活动,那么我们必须把下面所要论述的欧榘甲在其政论著作《新广东》所做的表述认为是在地方主义基础上的地方“民族主义”了。

(一)地方“民族主义”的胎动

欧榘甲(1868—1913),字云樵,号太平洋客,广东归善(今惠阳)人,1891年入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是当时有名的新式知识分子和新士绅。1902年,在对中央王朝彻底失望后,欧榘甲以笔名太平洋客在《文兴报》上连载长篇政论文《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²⁷篇,他大声疾呼“广东省,广东人之广东省也”,并且提出“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奋,不能不图自立”的广东独立的主张。该文1902年8月易名《新广东》,由横滨新民丛报社出版单行本。《新广东》一文出版后,“新广东”一词广为流传,在当时几乎可以当作是欧榘甲人人皆知的身份代码了。此后,类似于《新广东》性质的模仿性文章也相继出现,如湖南籍留日学生杨笃生以“湖南之湖南人”署名出版的《新湖南》。1905年,《新广东》《新湖南》《新民丛报》等二十多种“悖逆”书刊被清政府军机处严行查禁,可见这些著作在当时广为流传,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的^[10]。

在《新广东》一文中,作者分别论述了广东

必须独立的特质、原因、目的、方式等方面。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我们并不分析作者有否构建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广东民族的企图,我们只是试图通过地方“民族主义”的视角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这部时论著作。

1. 中央朝廷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感

作者在论述广东独立之必须时,让人处处感到了来自中央朝廷与帝国主义列强内外双重的压迫感。如在表达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时说道:“然而彼扬子江、东三省、云南、广西、福建、山东诸省,虽云默许诸国,而土地则完全如故,若广东则四分五裂矣。诸省虽云割弃,然成专归一国,而广东则祭仲之妻所云‘人尽夫也’,不知身属何姓矣。以现势论之站立:广地图中央者,非英、法、葡之三国乎?异日潮州或连福建而为日本所争,惠嘉或因教会而为德国所据(客人所居德国教会最多),西江诸府县或因商务铁路而为美国所要割,又必至势也,然则广东地图,其变为红色、绿色、白色、蓝色者实可预料。”^[11]283由此,作者隐隐地表露出一种对广东命运的担忧。这种担忧不单单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也由于他清醒地看到了广东不同于被专归于一国占有的其他省份,广东正在被多个国家分割,若现在不主张广东独立,将来的广东可能难以再团结为一个省了。其后果正如他所说的:“然则广东不能自立,广东之地,必全属于他人,广东之财,必尽夺于异种,广东之人,必尽沦于锋镝。”^[11]285

而对于北方朝廷的无能,作者也表示出极度的愤懑,表示必须与其决裂:“我中国人之甘为顺民也,以朝廷能保我也,朝廷不能保我而反弃我,是朝廷先为叛逆也。……斯时,君臣之义既绝,彼非我君,我非彼民,来侵者一例以敌人视之,且靖内,且括外,铁血流渐,以换国民之幸福而已。”^[11]274这种内外交加的压迫感,使得作者意识到广东之孤立无援,而必须谋求独立。

2. 广东人族群的统一

作者为了谋求一省作为一国的独立,则必须使省内各族群抛开分歧,去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由于广东省内有着客家、福佬、本

地粵人等主要汉族族群和其他部分少数民族族群,作者的任务就是论证这三个主要汉族族群的同源性。

作者认为:“此三者种族,同出一源,不过因声音而异,抱此劣见,犹之可也。……无论此三者种族,智识心思,脑轮角度,形体精神,不相上下,即以其族谱而言,其祖先莫不由中原丧乱,越岭南迁。故本地之族多由南雄而至广肇,客家之族多由雄州而至惠嘉,福佬之族多由江浙而转福潮,其声看之异,亦由所居之地而变迁意。常有一姓祖父子孙,不同声音者,居福潮则言福潮之话矣,居惠嘉则言惠嘉之话矣,居广肇具言广肇之话矣,然则因其言而定共为客、为土、为福者谬,因其客言、土言、福言而定其为黄族苗族,尤不可也。……然以大体考之,福佬本地皆有官话,字皆有可通,非若苗族也。然则三者同为种族,无可疑也。”^{[11]305}作者在这里所说的“种族”,即为现在所说的族群,也就是说他认为客家、福佬、本地粵人都为汉族无疑。

由此,作者抛开了方言的分歧,认为方言的差异仅为因居地变迁而产生,直接把三个族群都追溯到中原的黄帝谱系下的正统汉族。广东省内三个汉族族群的矛盾由来已久,这些矛盾基于方言和文化的分歧。作者把这三个族群追溯到一个血缘之下,其基本动机在于为一个类似民族国家性质的必须由同一民族组成的独立的广东省论证其民族的先天同一性。与此同时,作者还把他认为落后的苗族等非黄帝民族从广东人这一身份中排除出去。这样,一个不再有族群血缘分歧的汉族广东才得以在广东民众的观念中被建立起来。这种对广东省内各族群族源同一性的追认,与顾颉刚等学者在国家沦陷之际为构建一个同一族源的中国时所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史学论证具有非常类似的性质。

3. 独立的必要措施和准备

在论述完广东为何需要独立之后,作者为使这种独立观念不成为空谈,又提出了将其付诸实际的具体措施。

首先是开广东省自立报馆。作者认为广东

原来虽有省报,但依旧是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的附庸,没有表现出一省自理之精神和理念:“非有专言一省如何危亡,如何关系,如何愤发,如何联合,如何经营,如何改革,始可使全省人民,智识开通,张独立不羁之精神,不受朝廷之束缚,不受他邦之吞噬者。”^{[11]288}

其次是开自立学堂。作者提及广东原虽有水陆师学堂,但实际上是清政府教化和敛资的工具。因此,设立民间私立的学堂,是传播自由独立思想之必须^{[11]290}。

最后是组建秘密会社。清末民初的秘密会社多由同乡同地之人组建,其主体成员多为下层民众。作者对于当时遍布南方的秘密会社有切身的体会,认为秘密会社拥有极强的乡土意识和地域意识,容易激发一地之人的地方“民族主义”意识^{[11]293}。

由此可见,作者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历史上具有长时间中央王朝统治的国家的背景框限下,想要让广东人产生独立自主的意识,就必须通过各种可行的手段广泛传播广东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让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认识到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

(二) 地方“民族主义”的消解

之所以认为欧榘甲的思想是地方“民族主义”,是因为他的思想具备了民族主义的诸多要素。与土生土长的地方主义不同,以欧榘甲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地方“民族主义”包含了很多类似国家民族主义的特征。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省人的政治独立,这是一般民众的地方主义所不能发展到的程度。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原来存在分歧的三个汉族族群认可为同一血缘的族群,并把他们认为属于苗族的非汉族民族从“广东人”这一族群身份给排除了,由此把广东构建成为一个纯粹是汉族广东人占有的“国家”,这种思想已经基本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了。

然而,本文所说的广东“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还未出生便已消失了。因为作者基于各种原因最终把这种地方“民族主义”主动地纳入到国家民族主义的目标体系之中了。作

者认为:“当今世界上至大之问题,即中国之问题,中国若有自立,则世界之风云必为之变色,万国之政策必为之推移。”^{[11]308}同时,作者依旧认为整个汉民族的统一才是必要之务,广东的真正振兴,也只能基于中国的独立。所以,“务合汉族以复汉土,务联汉才以于汉事,以救中国,则中国可兴,以立广东,则广东可立”^{[11]310}。

基于此,作者又参考了近代德国和美国的建立过程,认为中国的汉人国家的重建可以基于各个独立的省的基础之上。可见,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把广东的独立作为最终目的,而是将其作为一级迈向更高的汉民族的复兴和独立的阶梯。就这样,广东的地方“民族主义”就发展到了极限,再不能脱离汉民族国家建设和汉民族主义的框限了。

三、广东地方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

在介绍了广东的地方主义和分析了欧榘甲所代表的地方“民族主义”之后,我们必须从地方“民族主义”为何没能在地方主义的基础上生成这个角度去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精英与乡土的交错

在论述广东精英知识分子的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被他们的话语所掩盖了的广大植根于乡土的农民的地方主义。中国自然经济特性的影响使广大农民的地方主义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始终,“秘密会社”即是农民的地方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清末的“秘密会社”多由受地方观念和宗族观念影响的农民和乡村手艺人集结而成,是一种缺乏明确的政治原则性和政治目标的组织。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时而也归顺朝廷,帮助镇压其他地区的秘密会社。因此,在他们自身的基础上没能够产生明确的国家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纲领。而受到了西方思想影响的广东精英知识分子则超越了农民的地方主义,将狭隘的地方主义提升到国家民族主义的高度。他们把地方主义作为一个阶梯,用以间接使民众理解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正如欧榘甲在他的《新广东》中所说:“夫治公事者不如

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亲戚急,爱中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如何也。……因人心视其生省份之亲切,易于鼓舞。”^{[11]270}可见,精英知识分子认为普通民众面对一个广大的中国,是难以产生一种切身的国家民族主义的,他们中大多数的生涯和视野可能仅局限于一省甚至一乡。

因此,精英知识分子们希望普通民众首先能够产生一种地方“民族主义”,产生对乡土的忠诚和热爱,然后以此为阶梯,去理解整个国家和汉民族中不同省份的人们之间的“无名的团结”。然而,他们在到达目的的前一步就改变了目标,在地方“民族主义”还未完全生成前就迈向了国家民族主义。由此可见,精英知识分子虽然打开了通往地方“民族主义”的通道,但又在到达目的地前改变了方向。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了普通民众的地方主义,又因为种种原因,使地方“民族主义”纳入到国家民族主义体系内,致使普通民众的地方主义再无可能提升为地方“民族主义”。

(二)身份与文明的执着

我们需要对上文所提及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两重性作出一定的解释,即为何广东的精英知识分子没有把当地的地方主义推升到地方“民族主义”的层次,却选择了将其向国家民族主义转化这一道路。

1. 基础要件的缺失

霍布斯鲍姆认为,从西方的历史经验观之,似乎只有三种固定标准可称得上是构成民族的要件:第一,它的历史必须与当前的某个国家息息相关,或拥有足够长久的建国史;第二,拥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并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与官方语言;第三,武力征服,唯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12]。这种西方的经验如用在近代中华民族的构建上也非常吻合。我们也可以用这三个条件去考察清末广东“民族”的构建活动。

如果要问清末的广东是否有外力的武力征服的压迫,那么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尤其对于

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压迫感应该比普通民众更加清晰和强烈。帝国主义列强在广东开辟市场,瓜分利益,并且以战争这一令人“瞩目”的显性形式宣告其侵略意图,这无疑让当时已经逐渐产生了国家民族观念的先进知识分子奔走相告:广东是“广东人之广东”。那么,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和独特的民族文学与语言呢?我们只能说有,但还不充足。在清末,虽然广东的精英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逐渐确认、创造自己的文化传统,使用其自身的书面语言形式。但是,这些努力无论如何都只是草创,还不足以称之为悠久,而且,这些新创造物都还未获得普遍的认同和广泛的传播。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否有足够长的建国史?虽然在古代,广东曾经出现过南越国、南汉等地方政权,但是存在时间不长、年代又太过久远,而且最后都被重组到中央王朝内了。所以,这个重要的基础要件的缺失致使包括欧榘甲在内的广东精英分子难以去构建一个独立的广东,明确的汉族性质也将建构一个新的民族之不可能一锤定音了。

2. “中华文明中心的南移”

作为我国一个在近代史上离西方的“距离”最近的海岸,广东省不但是最先受西方侵略的地区,也是当时思想最活跃的地区。与当时北方中原思想界的自闭和陈腐相对立的是,广东的精英知识分子则借助日本的译作大胆地向西方学习。他们在这种环境中意识到,虽然北方的中原地区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但是已经日渐式微了,而面朝大海的南方的广东,则是一片生机勃勃之地。

1905年,梁启超又撰一文《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论述了自古以来广东在世界史上的交通地位。他认为,虽然“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价值者也”^[13],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海运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若其对于本国,则我沿海海运发达以后,其位置既一变;再越数年,芦汉,粤汉铁路线接续,其位置将又一变。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14]。

由此可见,梁启超作为一个广东人,在新时代的面前,在新思想的熏陶下变得格外自信。

本文所述的先进知识分子欧榘甲也是如此,他们相信面朝大海的广东,其政治经济地位将不断提高,将逐渐代替北方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正是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这种自信和优越感,使得他们没有抛开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去构建一个独立的广东文明,而是把自己作为汇入到中华文明主干中的一股新的血液,把自身作为未来历史的叙述者和汉民族的新代言人,从而赋予了广东地方“民族主义”以汉民族主义的任务和内涵,使之成功转型。

四、结语

在一般的定义上,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扞格,但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下中,地方主义不仅没有阻碍民族主义的发展,反而成为向民族主义的过渡工具。以往,多数学者虽然已经注意到清末民初的精英知识分子借助地方主义去推动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但未说明其推动的具体过程。本文以欧榘甲的政论著作《新广东》为具体案例,探讨了广东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广东的“民族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由地方主义过渡到地方“民族主义”,再由地方“民族主义”升华到国家民族主义漫长过程。并且在这一探讨的过程中,我们也由此发现了省级地方“民族主义”为何没能形成的原因,即:一方面,精英知识分子身份的两重性,使他们既希望代表怀有乡土情结的广大民众,又不脱离华夏文化观和汉民族本位的限囿;另一方面,缺失霍布斯鲍姆所谓的“民族主义原型”中的基础要件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这些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普遍会遇到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更需要被重新深刻的理解。地方“民族主义”的消解说明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统一认同才是主流话语导向。晚清广东知识分子作为地方话语权力的掌控者之一,其做法也为解决当下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反思之处。

参考文献:

- [1] 埃里·凯杜里. 民族主义[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

- [2]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68-195.
- [3] 邱捷. 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在广东的发展[J]. 学术研究,1983(4):71-76.
- [4] 邱捷. 近代报刊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以研究清末民初的广东为例[J]. 民国档案,2003(4):121-123.
- [5] 张祖宝. 清末广东地方自治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2008.
- [6] 江远山. 近代中国地域政治化与国家建设——以广东为考察对象[D]. 上海:复旦大学,2008.
- [7] 程美宝. 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J]. 历史研究,2003(4):80-81.
- [8] 高丙中. 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J]. 社会科学战线,1996(2):109.
- [9] 程美宝.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10] 张军,裘思乐.《黄萧养回头》作者为欧榘甲考——兼论欧榘甲在前期《新小说》作者群中的重要地位[J]. 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9(1):29-30.
- [11] 欧榘甲. 新广东[G]//张枏,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12] 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 李金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9.
- [13]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第6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683.
- [14]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第4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692.

(责任编辑:李秀荣)

(上接第29页)青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理想信念,具有“补钙”的作用。其次能够发挥较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唐山精神”就是不同历史时期革命者的理想信念的时代篇章,也是一个个鲜活的政治教育案例,对被教育者而言,这种区域特性有着特殊的魅力和亲近感,对年青一代更有吸引力、感召力,更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以及认同。第三就是教育的方式可以更加多样化。由于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具有土生土长自然的人文特点,更容易讲好英雄故事,唤起受教育者的文化记忆,更容易感同身受。教育部门可以根据青年的年龄特点,编写适合的校本教材,以汲取历史的丰富营养作为年青一代成长的精神食粮。

“唐山精神”贵在精神,那些人与事都已融化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英雄的壮举已经升华为一种永恒的精神,精神长存、精神不朽,这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朽的基石。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将

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这是唐山文化建设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
- [2]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组.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4-35.
- [3]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西铺大队的经济发展[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66.
- [4] 习近平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OL]. 人民日报,2013-05-04[2018-03-20].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505/c64094-21367227.html>.

(责任编辑:李亚平)